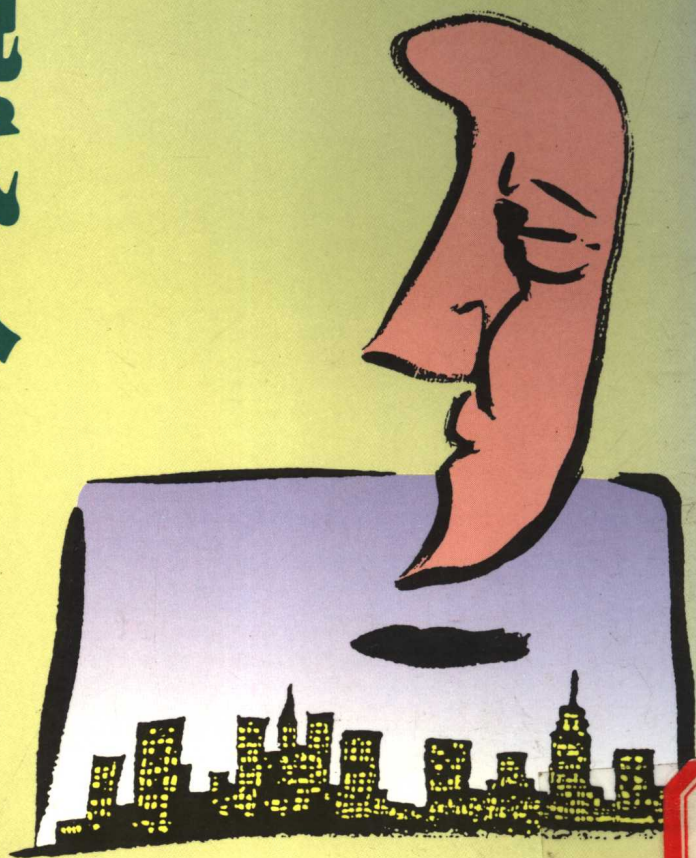


當代新視野叢書 ②

現代人 尋找丟失的草帽

——對文化與文藝在通觀過程中的發現

顧曉鳴 著



當代新視野叢書②

顧曉鳴著·廖仁義校閱

現代人尋找丟失的草帽



當代新視野叢書②

現代人尋找丟失的草帽

作 者／顧 曉 鳴
校 閱／廖 仁 義
發 行 人／賴 阿 勝
出 版 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 1166 號
地 址／台北市 10769 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 話／(02) 3416949・3631407
電傳(FAX)／886 2 3969194
郵 撥 帳 號／0104579—2
印 刷／嘉信印刷廠
初 版 一 刷／1989年 3 月20日 (印數1~2,000)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定 價／新台幣 200 元

當代新視野叢書總序

臺海兩岸幾十年來的分隔，由於政治的對峙，對當代的中國人而言，形成諸多的禁忌，一來兩岸相互的溝通，從政治到文化各個領域，幾被阻滯，彼此均無法真正的了解對方，予以適度的關心與信任；二來對峙的情勢，使得雙方各自在自己統治的疆域內，施加束縛，掩蓋部分真實，也阻滯雙方人民對自己休養生息的土地的了解。於是，生活在當代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始終缺乏開闊的視野。

所幸，當代的中國人尚未至全然被矇蔽的境地，此係由於縱使在這段處處佈滿禁忌的期間，仍然有一羣充滿理想、智慧的知識份子，敢挺身而言，為社會、為民衆揭露真實，不論這批知識份子是来自學院之內還是學院之外，也不管他們站在那個崗位，皆一本至誠，在揭露真實之外，還批判現實；在暗濛的時光甬道中，不時閃爍著點點智慧的靈光。

因此，即使我們沒有廣闊的視野，但不至於完全缺乏視野。在六〇、七〇年代以前，藉著知識份子的眼光，我們相當程度地熟悉了我們的社會。對這羣知識份子，我們心懷感激。

八〇年代開始，對臺海兩岸都是一種新的挑戰，很明顯地，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的社會體質，因著兩岸開放的接觸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釋放，日漸在轉化成形；禁忌與束縛的解除，將有助於雙方彼此及各自對自己的了解。此外，承替七〇年代以前知識份子的使命，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已然長成，在接受完整的學院教育後，開始踏出腳步，重塑「代言人」的角色。基於此，我們需要新的視野。

新視野的焦距放在當代以及臺海兩岸，檢視的是我們生長的家園，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本叢書編輯的構想即源於此，「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意義不大，主要是希望能讓當代的中國人，聽聽新一代的聲音，給予他們新的期待。是為序。

桂冠圖書公司編輯編部謹誌

逆向行駛的滋味

廖仁義

——顧曉鳴與《現代人尋找丟失的草帽》

我們通常以為，路是原來就已存在的，我們只需去走它就好了。但事實上，路真的是原來就已存在的嗎？不需有人去開拓，路就會自然而然伸展開來嗎？

我們通常也以為，路既然早已存在，我們就只能遵照現有的路標去走路。但事實上，路只能有一種走法嗎？難道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方法去走路？

——到底是人走路，還是路走人？

事實上，按照自己的方法走路的人並不多。一九八八年春天，當我讀到《現代人尋找丟失的草帽》一書時，我發現，這本書的作者顧曉鳴先生也是一個用獨特的步法走路的人。

乍看《現代人尋找丟失的草帽》這個書名，我並沒有馬上了解他的意思，再加上它的副題是

「對文化與文藝在通觀行程中的發現」，更使我一下子無法將正題與副題截然不同的語言風格做簡單的表層的理解。可是，就由於它們之間這種截然不同的語言風格，令我願意做進一步的深層理解，我感受到這個詩意盎然的正題底下，潛藏著作者不願落入一般文化論述俗套的叛逆企圖——他想用一種屬於自己的語言來表達他對尋常事物的不尋常體會。

《現代人尋找丟失的草帽》一書，不但書名有這種意味，而且整本書的結構、主題、詮釋觀點與敘述方式，都做了創新的處理，使我們幾乎很難界定它到底是屬於哪一類的書。說是文化理論似乎可以，說是文化社會學的書好像也行，但某種層次來說，它又像是一種跟現實脈動息息相關的 cultural 評論。

翻開這本書，一開始吸引我的就是它的目錄。它的目錄，讓我看到作者基於他豐富的想像力而做的文化反省與結構安排。第一篇〈文化與人〉，作者表現出他對文化學的堅實理論訓練，並能將他對中國文化的符號反省揉合到這種文化學的理論之中，使他站在一個視野寬濶的比較文化學的論述基點。第二篇〈社會與文藝〉，作者從人的時空位置，深入透視文化現象的歷史性與社會性，使原來可能無比尋常的生活情節卻因這種透視而突顯出多彩多姿的文化意義。第三篇〈失落與尋找〉，作者以他切身的經驗和敏銳的觀察力，將他的比較文化學和文化社會學的反省與透視運用在具體的文化事物——影視節目與文學創作——這些常被理論工作者所忽略的題材上。

也就是說，這本書結合了文化理論、社會反映與文藝創作三個層面。不過，這份目錄的特色，不僅在於它指示了這三個層面，而是在於它使這種指示具有了刺激讀者想像力的功能——你可以感覺到這不是一些死的條目，而是一種聲音，正在延伸你的思維空間。

這本書採用了「作者是觀察者」的敘述角度，也因此，當作者偶爾出現他的「我」在說話時，馬上能將他的敘述帶進一個你我都以介入的論述情境中共同面對主題。

儘管這本書不僅第一篇討論的是已經不再為臺灣讀者所熟悉的中國文化的象徵符號的意義，而且第二篇和第三篇討論的也幾乎都是發生在海峽對岸的社會現象與文化事物，然而，作者這種允許你我參與對話的敘述方法，卻能使我們毫不困難地進入到適合於主題的歷史意識中，對主題進行時空合宜的理解。同時，在我們對這些題材熟悉之後，也能得到跟作者相同的觀察者角度，對曾經發生而且正在發生的大陸文化進行客觀的反思，進而免除掉臺灣當前大陸熱所可能產生的幻想與偏見。

就是這種能夠喚醒相互主體性的聲音，使我渴切地想要走近這個聲音的發源地。

一九八八年十月下旬，在我以臺胞的身分走過令我盤扭的上海海關之後，我第一次見到「這個聲音」——顧曉鳴。顧曉鳴用他那騎了三個小時自行車卻不見倦態的容顏，使我方才祛除通關過程的盤扭。

顧曉鳴是個精力充沛的文化工作者。不知是因為他已經不再畏懼苦難，還是他生命中有著獨特的支點，他時時刻刻都表現出敏捷的動能，以及一份搞理論的人難得見到的感性和幽默。

雖然顧曉鳴是上海復旦大學博士的出身，而且任教於這所南方名校的歷史系，但是做為一個知識份子，他一如其他的大陸知識份子一般，亦只是滄海一粟。在偌大而顯得蒼老的上海巨城中，顧曉鳴只是一個踽踽行進的書生。然而，他的精神站姿是壯碩的。

他讓我感覺到，雖然他只是個微不足道的書生，雖然他是一個只能用簡陋的斗室來養活妻小的的小人物，但是，他不能不要求自己壯碩起來，因為，唯有壯碩起來，他才能不斷「發現」，不斷尋找被現代人丟失的「草帽」。「一個走自己路的人，不該說自己孤獨。他根本不該知道自己孤獨的！」顧曉鳴說。

他認為，「發現」能使自己欣喜，而能將自己的發現讓別人分享，更是值得欣喜。因此，他從不覺得自己孤獨，因為別人分享他的發現時，他感到自己是壯碩的。

目前，顧曉鳴除了擔任教職，在上海亦是一位活躍的文化評論家。評論範圍，遍及影視娛樂，乃至生活趨勢。但是他絕不是一個只見皮毛的所謂「趨勢觀察家」，而是一個能够從事深層解析「趨勢評論家」。前者只能隨波逐流，但後者，爲了維護文化的創造性，卻偶爾能够逆行行駛。

《現代人尋找丟失的草帽》便是他這些年來所寫文化評論的結集。由於他具有比較文化學方面的訓練，因此，多年來他都是在「多元思維」的前提下從事文化反省；除了這本《草帽》之外，顧曉鳴所編所寫的各種書籍，也都是從此一思維態度出發，譬如他現在正在主編的一套《世界學術名著精選本——看待多維世界的一百種眼光》，正是一個具體的表現。

由於顧曉鳴提倡這種「多元思維」，也因此他對文化現象的詮釋，往往會因此一現象出現在不同的時空而產生不同的意義，甚至於產生一些跟臺灣這個時空不同的意義——例如他對瓊瑤作品的詮釋。儘管我們不一定要完全贊同顧曉鳴的詮釋，但是，我們卻能從他的詮釋中，對文化符號以及詮釋它的方法進行另一種後設探討。

這種後設探討就是：到底是人走路，還是路走人？

走路一定得遵守路標嗎？如果路標已經混淆了方向。

現代人生活在佈滿路標的迷巷中，猶如走進陷阱四處的荒野。這時，自己的步法才能走路，而逃避陷阱或許必須逆向行駛。

顧曉鳴和他的《現代人尋找丟失的草帽》不時讓我們感受到這種滋味。

一九八九、一、十八、台北

發現和被發現的快樂——台灣版序

顧曉鳴

當我得知桂冠圖書公司有意出版《現代人尋找丟失的草帽》的消息的時候，恰好接到通知，我用該書同樣視角和風格寫就的電視評論，經專家投票，以最高票數獲得內地電視評論「金羽獎」的一等獎。我驀地感悟到一種被發現的喜悅——「發現」，這曾是我寫這類社會學和文化學文藝評論的焦點；這幾年來借助學術視野在社會生活和文藝的通觀過程中發現的點點滴滴，灑落在《草帽》一書的字裏行間，如今，承蒙專家和讀者的厚愛，大家又在這雜雜沓沓的文字中間，發現了我這點點滴滴的發現，給予鼓勵和嘉獎。至此，我的發現因著讀者的發現，方才有資格談得上是「發現」！於是我經驗了發現和被發現的雙重快樂！

「發現」和「被發現」，我們就是這樣深深地捲入了文化的互動之中：任何的創造都有賴於觀眾和讀者的發現，而旨在發現的論評，最終也依賴於他人的發現，才能完成。

正因為我對這種文化學機理有著一種敏感，因此，當我知道《草帽》受到部分臺灣友人的器重時，不只是一種受人賞識的本能喜悅，而且更是一種知性的快樂。因為，與內地文化溝通不暢已有很久的海峽另一邊的同胞，在多少有別的文化情境中，對我的發現有著一種共鳴，本書無疑是經受了一次學術的檢驗，我區區作品的意義發生了一次昇華。這就使我本人也重新發現了自己的「發現」，更加敝帚自珍了。

這種喜悅，這種自珍，還不僅僅在於個別的文藝社會學的見解，更在於，本書臺灣版的出版，證實了我在本書〈創造作為整體的中國現代文化〉一文中的見解：

「撥開由於社會制度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外觀，大陸中國人、臺灣中國人和僑居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不僅具有同一的文化之根，而且在現代文化中有著不可分隔的整體性和內在一致性。……整體現代中國文化的形成，要求我們自覺地在文化各個方面進行熱情的『求同存異』的工作，同時，要盡一切可能促使各種華人社會的文化人情同手足的合作、理解和溝通！」

這本小書受到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歡迎，它不正是「情同手足的合作、理解和溝通」的一種表徵麼？其實，大量臺灣版的圖書早在內地出版，受到了熱烈歡迎；不少內地版的圖書也正在臺灣

出版，相信也將會擁有不少的讀者。這意味著更宏大的文化互動之輪已經開動，這種互動的結果，必將使兩邊現有的文化水準有進一層的提昇！我們大家都會得益於此，對生活、文藝和學術，定然會更有一重新的發現！

願讀者諸君都來分享我的「發現」；願我能不斷享受「被發現」的快樂！

文化・社會・文藝・在通觀行程中發現——原序

我敢說，當代最不起眼然而卻是最重要的詞彙是：發現。「你發現了什麼」，這一句簡單的問語一旦成爲判斷人生、藝術、科學的標準，會使我們自己多麼地自慚。小至穿一件什麼顏色款式的衣服、學習一件什麼樣的技藝學問，都是以我們是否發現「時髦」和「學問」、是否發現「自我」爲前提的。成萬上億的服裝樣式和書籍知識中，究竟哪些真是時髦和學問？究竟哪些與我們自身相結合，能從此爲人類增添一樣新的時髦、一點新的學問？人生成爲發現的過程，我們正是隨著時間的流程，在生命的體驗中，發現周圍的世界，發現自然，發現人們會笑會哭會有些極微妙極深邃的社會表情……愛人和愛情是靠我們的發現而獲得的，連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之情也是如此……整個世界，無論是自然界還是社會界，固然先於我們已經存在，但只有在我們的生活過程中，才真正發現它們那富有永恒哲學意味和對自己現實意義的存在——沒有發現的生命算是

白活了一世，你有發現的慧眼，也許你比常人多活了幾個人生！

藝術，那是什麼？那正是具有發現的慧眼的人們，在常人熟視無睹的世界中，透視出用美、意義、價值構成的另一重世界，並用文字音符、圖像色彩這些文化的標記固定下來，以其特有的文化的存在——極端的形式便是對另一種文化的人們來說是天書一般的「文學」，把這一重文化的世界變成爲人類創造的現實和人類的集體記憶，代代相傳，萬世不竭。每一代人出生的時候，就完全不是像動物那樣只面對一個由自然和自己肉體所組成的世界，而是面臨著一個自然和人類文化交織在一起的、有美、有意義、有價值的世界！每一代人以文化的形式，承繼了上一代人的「發現眼光」，於是，我們眼下的這些人，在青少年時就知道水是由氫和氧組成的，並知道如何從電影「雜亂」的蒙太奇中正確地領悟現實的世界！

然而，新的一代在有幸享用上輩人的發現的時候，都面臨著世代的責任：我們發現了什麼？對個人來說，問題更加嚴峻：先人們流傳給我這麼多的發現和發現的能力，我又在多大的程度上重新發現了他們的發現，並用他們創造的能力，有一重新的發現？

於是，藝術的形式、手法等等，變得愈來愈次要，藝術家的使命、藝術品的內涵和價值集中在：你發現了什麼？而藝術鑑賞，沒必要糾纏在細枝末節的淵博知識上，鑑賞水準的高低竟只在於這樣一點：你發現了什麼？

讓我們到美術館去，到音樂廳去，到文學家、作曲家的斗室中去……你會看到那些身手不凡的藝術家們賦與全身心的努力的是：發現。無論是孜孜於先人的藝術樣式，無論是深掘著特殊的人生體驗，無論是乞求於靈感的偶發，無論是沉浸在哲理的思考——二十世紀的藝術家們不約而同地試圖在那些用熟了、用爛了的詞語、音符、圖形中，構建自己對世界獨特的理解，在自己的作品中發現自我和創造自我，而在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不約而同地又把目光指向科學，尤其社會學科學！

因為正是社會，構成了文藝和文化活動的對象和環境，文藝和文化品的描寫對象、服務對象和存在形式（一切藝術品的存在以社會性的觀聽衆的存在爲前提），於是無論對文藝創作還是文藝鑑賞，發現的焦點就在於對社會和人的洞察、理解和感悟！

然而，社會就在這裏，需要的是一雙眼睛；並非任何身在社會的人都能「看」到社會的。因此，利用社會科學尤其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視野，來挖掘一重新的文藝經驗，無論對於藝術家還是對於鑑賞者的發現，都會助上一臂之力。

悖論倒在於：挖掘這一重由社會學視野而獲得的新文藝經驗的人，你自己有多少新的發現呢？確是如此，這也許是文藝和科學、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關係史上永遠解決不了的方法論問題——究竟是依靠對生活的直覺體驗而創造的文學藝術家們先發現新的東西，還是有關的文藝批

評家和理論家更高明一些呢？我想沒必要尋求絕對的結論，發現總是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的社會性的發現，文藝家的發現和理論家的發現是不可分割的社會互動，正是在相互吸收和批評的相互作用中，達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新的發現！

於是，文藝社會學也罷，社會學視野中的文藝也罷，既不可能產生於從現成理論出發的演繹，也不可能以馬後炮的方式為文藝家的創作詮釋圖解，而是需要尋找一種研究和寫作的特殊方法論——如何概括呢？我想到了法國詩人和文藝理論家梵樂希（P. Valér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一段雋永的話：

「走路，像散文一樣，有一個明確的目的。這個行為的目標是我們所希望達到的某處地方。實際的狀況，例如對某一物體的需要，我的願望的衝動，我的身體狀況，我的視力，以及地形等，都影響走路的方式，決定了走路的方向與速度，使走路有一個明確的目的。走路的一切特點都是由這些瞬間的狀況而來的，這些瞬間的狀況每次都以新的方式組合。走路的所有動作都是特殊的適應，而到達目的地後，這些動作都被廢除了，彷彿被行為的完成所吸收了似的。」

文藝評論的「走路」還要更複雜一些，因為，評論的對象是另一個也在這樣走路的人；社會